

# 城市科学建构与中华民族的城市启蒙\*

刘士林

**[摘要]** “众声喧哗”和“谱系杂乱”是当下中国城市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与我们在研究中缺乏具有独立形态的城市科学体系的逻辑规约和价值引导直接相关。在世界城市化背景下，有必要形成新的理论共识和自觉，以城市科学的基础理论与学科建设为中心，推动城市研究的学科整合，通过跟踪与解决城市重大与关键问题带动相关理论研究的系统集成及协同创新。当前急需解决的是树立正确的城市观和普及城市科学知识，并在这个基础上重建当代中华民族对城市的感受、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和审美趣味。“城市启蒙”的目的是推进人在城市中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当代城市启蒙的主要任务在于：一是建构城市理性，发现人作为城市人的存在；二是大胆使用城市智慧，破除城市化带来的蒙蔽和愚昧。人文科学在未来的城市科学中是基础的基础，具有知识枢纽和价值灵魂的双重重要意义。

**[关键词]** 城市科学 学科整合 城市启蒙 人文学科

**[中图分类号]** C912.81; G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12) 10-0020-05

“众声喧哗”和“谱系杂乱”是当下中国城市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与我们在研究中缺乏具有独立形态的城市科学体系的逻辑规约和价值引导直接相关。当下的城市研究，既包括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人口学、公共管理、传播学等社会科学，也包括近年来新兴的文化研究、文化产业学、文化遗产学、都市文化学、城市设计、城市哲学等交叉研究，此外，还吸引了中国文学、历史学、艺术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参与。尽管这种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与研究队伍恰好对应于当代城市发展本身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且围绕着城市发展中的环境、交通、生态、管理、设计、文化、历史、精神、心理等问题，既有各种专门性的城市研究成果大量出现，也有一些涉及城市一般发展与演化规律的共性探索；但就城市研究的总体现状而言，由于在传统上形成的学科壁垒，我们对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规律、本质、特点和趋势还缺乏系统、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面对高速发展、层面众多和环境复杂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这个进程中表现出来的中长期与当下需要、总体目标与局部利益、空间资源与现实条件、物质文明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矛盾冲突，我们的城市研究可以说是严重不适应和不相对称的。我们的城市研究理应在认真清理早期经验和深入反思其得失的基础上，努力建构更有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首批资助项目“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10JBG011）暨上海交通大学985三期文科专项特色研究基地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200240）。

创造性、更符合逻辑进程以及能更主动承担历史必然要求的城市科学，在全面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城市化背景下进行学术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同时，为人类在城市时代提供科学的理论工具和真实的生存智慧，为中国城市化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和营造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

### 一、城市科学的基本问题与学科框架

从总体上看，前工业化与工业化及后工业化、城镇化与城市化及都市化、政治型城市化与经济型城市化及文化型城市化的同时并存与相互冲突，是我国当前城市化的本质特征与突出特点；而源于不同地理空间、历史阶段和社会集团的各种城市话语与价值谱系既彼此对立冲突又各具历史合理性，则是在当下很难形成主流话语并在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的现实根源。尤其是当代以大都市和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在空间与人口规模、经济与社会关系、文化与心理问题更加复杂和多元，使原来各自孤立的都市研究因研究对象本身过于复杂而很难独立承担解释和批判现实的任务；同时，当代都市迅速聚集大量优质人力资源、先进经济要素与优质文化资本，也进一步激化或加大了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矛盾与差距，使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城市世界充满了更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其特有的复杂性和巨大矛盾远远超出了形态简单、方法朴素的传统理论的认识与解释阈限。这就有必要探讨和尝试建立一门新型交叉学科——城市科学，以当代城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与关键矛盾为中心确立研究对象与范围，凝聚和集成各民族、各地区、各历史阶段的知识、方法、思想、理论和智慧，应对当今世界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城市科学是关于城市化或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层本质、整体特征及当代形态的理论体系。与任何一门新理论、新学科的创建一样，城市科学的基本问题即“一门纯粹的城市科学如何成为可能”？在理论研究越来越后现代的背景中，如果说这个带有浓厚思辨哲学色彩的问题显得不合时宜，那么也可以把这个具有奠基意义的提问转化为：“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是否存在着普遍性或共通性的问题、范畴、知识、方法、框架与规律？”这是一个发生在具体的城市研究之前的、具有先验性质的问题，并明显地超出了实证哲学或一般经验研究的范围，对它的回答与态度不仅取决于人们对当代城市的知识积累和经验研究，同时也与个体或群体的意愿、价值观乃至信仰密切相关。从西方城市研究的经验看，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归纳出两种主要的观点与态度。一是悲观学者把城市本身理解、描述为“无序的复杂性”，更有甚者还把人类治理、改造城市的努力与实践称为“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分别在逻辑和实践两方面否认了建构城市科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二是以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为代表的“有机整体”观。她说：“城市……问题表现出很多变数，但并不是混乱不堪，毫无逻辑可言；相反，它们‘互为关联组成一个有机整体’”。<sup>[1]</sup>城市既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其本身就必然存在着共通性的特征、规律与本质，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据此建构出一门名为“城市科学”的新理论、新学科。关于这一点，还可追溯到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简言之，“当代都市社会尽管在内容上包含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质，在形式上与农业文明、工业社会也有本质的不同，……但在深层结构上仍是‘物质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及‘精神生产’三者相互对立又不断沟通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原理同样适用于都市社会的再生产过程”。<sup>[2]</sup>而作为人类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当代城市当然是有章可循和有理有据的，关键在于如何发现或建构出其内在原理与相互作用机制。

当代的城市研究，在各种知识、话语、理论、价值之间，无论由于门户之见它们曾怎样相互排斥与对立，但出于人类在城市时代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的巨大理论与现实需要，这些知识、话语、理论、价值必能找到彼此之间更深刻的内在逻辑联系，并同样注定了要使自己归属于作为未来理论与意识形态主流的城市科学共同体。以我国当下的城市研究为例，尽管相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长期以来各自为阵、壁垒森严，甚至同一学科与理论内部也各持犄角之见、互不兼容，但从深层的逻辑相关性角度看，它们无不可理解为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揭示出城市化或城市本质的某些侧面，并为我们建设“城市科学”预备或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素材与理论条件。首先，一些敏于时代变化、开风气之先的新

知识和新探索，在推动传统学科与理论进行“城市转型”时发挥了积极的启蒙与引导作用。如近年来兴起的“都市文化学”，与孕育并固守于传统农业文明与文化价值体系的当代文史研究不同，“都市文化学”一方面自觉地扬弃那些排斥、敌视城市的传统知识与理论范式，从古典文学研究中拓展出古代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从古代历史研究中拓展出古代城市史研究，有意寻求并努力建构传统文史之学走向当今城市世界的桥梁与路径，另一方面，则是重新审视自然与文明、乡村与城市、审美与欲望的关系，主动回应当代文化经济发展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巨大现实需要，根据都市文化的规律开展都市文化的新理论与新学科建设，努力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解释框架与价值系统。其次，与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相呼应，“城市科学”在我国学术理论界已呈“小荷初露尖尖角”之象。2011年5月，在城市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睐的背景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率先设置“城市科学”新目录，在国内首次尝试城市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制度建设。同年10月，“2011交大城市科学秋季论坛”提出“针对我国城市高速发展的现状，学术界应考虑建立一门独立、系统、专业的城市科学，以便为城市化建设提供更充分的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sup>[3]</sup> 尽管城市科学的提出只是初步的和试探性的，但其深层却存在着一种强大的逻辑张力，就是认为过于专业化与精细化的传统学科架构，已越来越不适应在形态上以多元性和异质性、在功能上以世俗化和消费化为主要特征的当代城市发展。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世界城市化背景下形成新的理论共识和自觉，以城市科学的基础理论与学科框架建设为中心，推动相关城市研究理论进行学科整合与视界融合，使处于潜形态的城市科学成为现实中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理论，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基础性的科学方法、理论体系与价值理念。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之后，目前提出和建设城市科学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具体言之：第一，在与城市发展相关的传统学科领域中，一些城市科学分支已经发展、培育得较为成熟，如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人类学、城市地理学等；第二，为了适应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与逻辑需要，一些与城市密切相关的新理论、新学科正不断地从传统学科阵营中孵化、独立出来，如以中国文学为母体的都市文化学、以美学为母体的城市美学、以考古学为母体的城市考古学、以人口学为母体的城市人口学、以公共管理学科为母体的城市管理学、以传播学为母体的城市传播学、以城市地理学为母体的跨越大都市区地理学等。基于城市化的现实需要与城市研究的前期积累，我们认为，城市科学的理论与学科建设可以按照如下思路推进：首先是对传统的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人类学、城市地理学等展开内涵建设，主要工作是围绕基本概念、范畴体系和逻辑架构的审查与重构，完成这些传统城市理论的知识更新和系统升级，更好地适应当今城市化的现实需要；其次是对近年来一些初具规模的新理论和新学科——城市生态学、城市设计学、城市管理学、城市文化学、城市史学、城市美学等——进行梳理和规范，主要任务是明确这些新理论、新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对象与范围，通过学科框架建构对相关理论与学科资源进行优化组合，推动这些新知识、新理论、新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再次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提出和创建一批具有基础构架和重大现实需要的新学科，如城市科学理论、城市环境科学、城市交通科学、城市信息科学等，一方面，以城市科学理论建设改变由于缺乏基础理论支持而长期存在的研究分散、话语杂乱、学科间缺乏协调和整合等问题，为在城市科学整体框架下改造旧学科、建设新学科提供可靠的基础与原则，另一方面，以城市环境科学、城市交通科学、城市信息科学等为中心，通过跟踪与解决城市重大与关键问题，实现传统城市研究的升级和新学科方向的融合，为带动相关理论研究的系统集成及协同创新提供示范。

## 二、城市科学的知识启蒙与人文理性

当今世界是城市的世界，改革开放的中国正成长为“城市中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除了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看病难、上学难、食品安全等突出的现实问题与矛盾，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意识、思想、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结构。特别是数量庞大、来自农村的新城



市人，由于对新的生存环境、工具技术及游戏规则的陌生和不适应，他们很难切实地分享到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利益，很多人还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与客观的价值立场，也使人们对城市容易采取简单化、非理性思维甚至极端化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与当下城市研究主要以古典人文精神和现代理性系统为核心理论资源密切相关，由之产生和传播的大量知识、观念、理论与价值判断，在主体内部为当代人在城市中生存与发展设置了诸多的观念屏障和心理障碍。因而，在当下中国，急需解决的是树立正确的城市观和普及城市科学知识，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当代中华民族对城市的感、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和审美趣味。一言以蔽之，“城市启蒙”已成为我们民族在当下最需要的精神觉醒和文化自觉。

“城市启蒙”的目的是推进人在城市中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从思想史上看，启蒙的要义有二：一是“哥白尼式的革命”，即人在理性照耀下发现“自己的存在”；二是“大胆用智”，即通过理性审判破除“心灵的蒙蔽与黑暗”。<sup>[4]</sup>由此出发，当代城市启蒙的主要任务在于：一是“建构城市理性”，发现“人作为城市人的存在”；二是“大胆使用城市智慧”，破除“城市化带来的蒙蔽和愚昧”。城市发展尽管问题众多，城市科学尽管内容复杂，但只要确立了这两大主题，就足以发现并开启我们这个传统农业民族的“城市启蒙之门”。

当下与城市相关的研究分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固有的学科壁垒使三者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严重不足，这使我们的城市研究往往表现为一种“片面的深刻性”或“局部的有效性”。首先，自然科学的城市研究最有实用价值，如在城市规划、建筑、交通、环境、科学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当代城市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但由此带来的环境、生态、技术伦理、心理压抑等问题也日趋严重，并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解放和繁荣。其次，社会科学的城市研究目前最为活跃，如城市社会学、城市人类学、城市管理学、城市运筹学等，通过实证、统计得来的各种数据及建立的模型，已成为当下城市提升科学决策水平及管理效率的主要参考依据。但出于排斥“情感、信仰”等人文问题的实证科学本性，这些研究往往在根本上忽视了“为了更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质，这一缺陷在当下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再次，这并不是说人文科学或人文学者的意见就是真理和权威，实际情况是，由于既缺乏自然科学可以增加城市财富的“硬实力”，同时也缺乏对城市社会深入和科学的调查与研究，很多人文学者的意见与表达往往沦为“愤青”式的“酷评”和非理性的“发泄”，不仅无助于人们了解和认识真实的城市世界，相反还在人与城市之间制造了更多的价值与心理障碍，所以那种排除社会科学的城市人文科学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必须尽快结束三大学科门类长期以来形成的孤立与对立状态，改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那种一方面的发展必定牺牲其他方面合理需要的“恶性生态”，以及在更开放的城市科学框架内实现这三种基本知识理论的协调和统一。

当然，推进三大学科的有机融合，决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特别是与传统的“乡土型知识”倾向于封闭、保守、自洽相比，城市本身的复杂性、城市人的多元需求以及城市文化的异质性使这一努力明显会遭遇到更大的困难。我们认为，在这个整合过程中，关键问题不在于知识、话语与理论的“细节”，而是首先要确立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从当代城市和城市化的规律和特点出发，必须清醒认识到城市科学在基本框架上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同时只有从这三大领域中吸收到充足的营养和思想资源，才有可能建立一门逻辑上合法、历史上合格的新型交叉学科；第二，在推动中华民族的城市启蒙中，必须确立实施知识整合与价值建设的逻辑起点，即以什么样的基础框架去整合数量庞大、内容复杂、彼此冲突的城市知识与理论话语。对此我们认为，人文科学在未来的城市科学中是基础的基础，具有知识枢纽和价值灵魂的双重重要意义。只有以人文科学为中心，才能建成一门真正符合城市本质和时代需要的城市科学。

城市科学为什么要以人文科学为中心？简言之，正如芒福德强调指出的：“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结。”<sup>[5]</sup>在以理工科为中心、社会科学为有用之学、人文学科

“可有可无”的当代学术框架中，对主要负载城市“价值”与“美感”的人文科学的轻视或无视，是我国城市病、城市社会问题及城市文化病越来越严重的深层原因，也是在当下最需要加以破除的“城市理论愚昧”之一。以人文科学为中心建设城市科学，其要有三方面。第一，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有价值、更美好”的生活，无论是从城市在起源时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为了更好地生活”，还是从城市发展的未来——如上海世博会提出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都表明城市的最高本质只能由人文科学来揭橥和护持，这是城市人文科学在城市科学体系中必须占据中心地位的主要原因。与之相比，“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基本上没有触及到。即使偶然也有注意到文化要素的，但局限于社会学科的实证本性，一般也仅仅停留在文化产业等文化的实用与商业价值层面，对其更深层的文化价值则基本上是置若罔闻的”。<sup>[6]</sup>第二，在现代“城市问题”与“城市危机”中，一个突出的矛盾是“物质生活与精神情感”的二律背反。如美国学者柏忠言所说：“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某些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一个人会物质富裕而仍然感到不幸福。……但是，事实仍然是事实：许许多多‘拥有一切’的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的确是痛苦的。他们的是如此痛苦，以致要通过自杀或吸毒来结束或忘掉自己的存在。”<sup>[7]</sup>科技的进步只能改善城市的资源与环境条件，与人在城市中生活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并无直接的关系。由此可得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城市科学体系中的层级关系，即以“美”和“自由”为灵魂的城市人文科学是核心结构，以“善”和“秩序”为主要内涵的城市社会科学是中层结构，而以“真”和“物质”为主体的城市自然科学则是表层结构。同时，这也可以为城市科学的知识建构确定一个基本原则，即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时，应以社会科学为主导，因为社会科学关系到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目的；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交叉时，则应以人文科学为主导，因为只有人文科学才关系到社会科学实证范围之外更根本的价值与意义问题。第三，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时代背景下，树立人文科学在城市科学中的核心地位，符合我国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与长远利益。当然，在坚持城市科学的人文精神的同时，也要注意人文科学自身的改造和升级，特别是积极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信息技术，使城市人文科学自身在更加客观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进行思考和研究。

在世界城市化和我国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科学在全球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顶层设计、全局视野、战略核心的重要地位。同时，城市化作为涉及亿万民众生存和发展的现实进程，也是真正有当代世界意义的“天下大事”。如果说每个时代都有安顿苍生的“真学问”，那么城市科学就是当今世界的“性命之学”。就此而言，建设一门以城市为对象的独立的新型交叉学科，为人类城市化提供理论基础、科学方法和价值体系，正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理想信念的当代践履和躬行。

#### [参考文献]

- [1]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485页。
- [2] 刘士林：《都市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 [3] 郭潇雅、孔铎：《上海交大举办2011城市科学秋季论坛 倡导形成独立系统的城市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8日。
- [4] 刘士林：《一个人的文化百年》，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7-120页。
- [5]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 [6] 刘士林：《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学术研究》2007年第10期。
- [7] 巴克主编：《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96页。

责任编辑：王法敏